

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第三节 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朱德的母亲

朱德的生母钟氏(1858—1944)，从小生长在极端贫困、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流浪艺人家里。钟氏19岁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钟氏生朱德的前几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朱德呱呱坠地之后，她又起身接着做饭。钟氏生有13个子女，由于生活艰难，有5个刚刚生下来就被溺死。钟氏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因处于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钟氏未能如愿。1944年2月15日，钟氏以86岁高龄辞世。

蔡畅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说，朱德母亲的模范行为是妇女界的光辉榜样。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的挽联是：“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钟氏去世之后，朱德十分悲痛，百忙之中写下了《回忆我的母亲》，发表在1944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几十年之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老母逝世前连一杯水都没倒。”现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摘录如下：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

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年)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

家。父亲在回家途中就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第四节 烈士妈妈——江竹筠

20世纪60年代，一部小说《红岩》红遍中国，其主人公江姐及其原型江竹筠更是家喻户晓。50多年过去了，江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依旧高大。

江竹筠烈士（1920—1949），四川自贡人。“江姐”是人们对她的爱称。幼年做过童工，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1947年4月随爱人彭咏梧去下川东发动武装起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监狱。狱中，她经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但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江竹筠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

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 10 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 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 1939 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 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 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 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 1600 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1948 年 4 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 月,江竹筠被逮捕。

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夹竹棍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 年 11 月 14 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盐酸毁尸灭迹,时年 29 岁。

2009 年 9 月 14 日,江竹筠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江姐在临刑之前还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的。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充满了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

2007 年 11 月 14 日,在江姐牺牲 58 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向世人揭开尘封已久的秘密,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遗书写于 1949 年 8 月,江竹筠烈士的爱人彭咏梧已不幸在起义中牺牲,自己又身陷囹圄。面对死亡,她是从容无畏的。然而,在充满黑暗、暴力的渣滓洞狱中,却时刻思念着寄养在亲戚谭竹安家中的儿子彭云。于是,带着酷刑留下的累累伤痕,她留下了一份遗书。信中告诫要培养孩子树立远大理想,为建设新中国献身,绝对不可娇宠溺爱,饱含着一个革命母亲对孩子的深切厚爱和殷切希望。读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有的字着墨较重,大约是狱中书写工具粗劣所致。这页手掌般大的遗书,对人们的教育、启迪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自陈列展出以来,



广大观众无不以为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崇高的思想境界所感动。

遗书长 14.5 厘米,宽 13 厘米,淡黄色毛边纸。从右向左直行书写,字体娟秀。1950 年,西南博物院发现后随即征集入库。现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城市之路”展厅。



“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工作人员说,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是怎样悄悄写下遗书,又是怎样把遗书送出监狱的?三峡博物馆有关人士揭开了谜底。

当时,江姐被关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江姐托孤遗书(部分)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 6 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竹姐

8月26日

记者在美国采访了彭云。彭云表示现在为国家做的事情少了,但从没做过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家人朋友的事,他称今后有机会还是想回国。记者见到彭云的第一感觉是酷似江姐,彭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和母亲都是小宽脸,年轻的时候更像了,大家都这么说。”事实上,因为一岁多时即与母亲分开,彭云对母亲所有的记忆都来源于几张有限的照片和他人的叙述。

彭云的父亲彭咏梧在与江竹筠相识、相恋之前，已与老家重庆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彭咏梧和江姐并肩战斗，做了两年的假夫妻，最终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1946年4月，妈妈在成都生下了我。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彭云说。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

1949年8月26日，江姐在狱中写下托孤遗书。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这封信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从1948年2月接过彭云到解放前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刚解放的时候，彭云三岁多，当时谭正伦还不知道彭咏梧和江姐都已经牺牲，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小彭云到处寻找他们的下落。彭云说：“当时重庆成立了几个‘脱险同志登记处’，谭妈妈背着我一个挨一个找都没有找到。后来得知母亲在十天前已经被杀害这个噩耗，谭妈妈又背着我到埋有被杀害的烈士的地方去找。不久后我们又得知，父亲早在一年前就牺牲了。”

后来，谭正伦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两兄弟培养成人。彭云说：“虽然有时和别人提起时为了能和我的亲生母亲相区别，我称她谭妈妈，而实际上，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

彭云说：“谭妈妈退休后和哥哥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我儿子壮壮出生。1976年，谭妈妈就在准备到北京来看孙子的前一天，亲友们在成都为谭妈妈饯行，她突发高血压去世了，那年才59岁。没想到谭妈妈会在上火车前的最后一刻突然离世，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

彭云从小就在母亲江姐的光环中长大，与彭云中学同窗六载的卢晓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中学时代的彭云这位烈士遗孤享受的“特殊待遇”：“我们这个班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她还回忆，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

卢晓蓉这样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骄傲，始终保持低调。然而彭云本人却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如今，已经年近七旬的彭云谈起中学时代的记忆，表情依然天真。

有一件事情彭云至今还记得：“有次我们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

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我的衣服和眼镜和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

1965年，19岁的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0年毕业后分到了沈阳一家工厂工作。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易小冶家在北京，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全家得以团聚。

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了一年访问教授。

1987年，彭云回国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来，美国一家知名的出版社看中了彭云的博士论文，请他担任第一作者，与导师合作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写出版一本专著，彭云因此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他的妻子易小冶也先后在美国取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知名大学做到了终身教授，如果是普通人，可以安享羡慕的眼光。可是彭云不一样，因为他是江姐的儿子。彭云是位真诚和严谨的学者，他总是倾向于压缩自己取得的成就。记者提到“终身教授”这个令人景仰的称谓，彭云赶紧解释：“美国大学里如果到了一定年限还没成为终身教授，就意味着不能再教下去了。终身教授里有正教授，也有副教授，不是像中文听起来那么神圣。我的职称是正教授。”目前彭云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关于自己的家庭和双亲，彭云轻易不肯言及，大概是小的时候受到了较大的刺激的原因吧。

那是在1965年8月，彭云刚入伍，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经过短暂的人伍训练后，10月初他就被送到当时驻防在齐齐哈尔市榆树屯村原陆军第23军69师当兵锻炼。去之前，学院考虑到彭云的安全，决定让他化名为李实。到了部队后，同学们对彭云一直以李实相称。可不久后，彭云还是被一位细心的战士认了出来，团里顿时传得沸沸扬扬。团里看到实在瞒不住了，就请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要求公开李实的真实身份，并要求他给全团干部战士作一个公开的传统教育报告。这一请示很快获准。

1965年10月底，彭云在206团大礼堂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过程。讲到母亲江姐时，他说：“对母亲，我没有一点直观感觉，只有一张和爸妈的合影。”对着那张合影，彭云的眼圈有点红了，会场也鸦雀无声。彭云为人很实在，实话实说，没有一点做作。

第五节 倏忽人间四月天——梁从诫回忆母亲林徽因

林徽因(1904—1955)，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国著名女建筑师、诗人、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建筑大师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20世纪30年代初，她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

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文学上,著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一代风华的绝世佳人,才华横溢倾倒众生。

梁从诫(1932—2010),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会长。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2010年10月28日病逝,享年79岁。

梁从诫先生一切从简约开始,他的名片用废纸复印而成;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坚持用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一次,他骑车去政协开会,让门卫给拦住了。原来,门卫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全国政协委员骑自行车来开会。在一次政协委员考察途中,同车的人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子随手扔在了车外,梁从诫马上让停车,下车捡起被扔掉的瓶子,说“瓶子要回收”。

下面是他回忆母亲林徽因的文章。

母亲去世已经三十二年了。现在能为她出这么一本小小的文集——她唯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伤。

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消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着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一九二〇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十六岁的母亲同行。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一九二四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一九二七年,父亲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立,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余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三十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国内

